

柏杨政治文化批判的焦点和特色

——以1960年代柏杨创作为中心

朱双一^{1 2} 陈婵敏³

(1.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2.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3.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1960年《自由中国》被迫关闭后,李敖等西化派知识分子转向文化批判,柏杨却仍执着于政治批判,成为1960年代台湾地区勇敢揭露现实政治弊端的第一人。他一方面讽刺官僚统治者既抓“权”又抓“钱”的“二抓”行径;另一方面更揭露包括“白色恐怖”在内的官僚机器对于社会民众的压制、管控和迫害。他与徐复观等国学大师相亲和,借助胡秋原、李宗吾等的著作,进一步挖掘腐败官场政治所产生的深层历史文化根源,对“酱缸”文化深加反省,从而具有了思想史意义。柏杨“责之苛”缘于“爱之切”,对广大民众饱含关爱和同情,在卑微而自尊的普通民众身上照见了民族的希望和信心。他反对当时台湾地区盛行的媚外西化之风,与鲁迅相似,他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弱点加以反省和批评,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是对中国、中华民族大爱的表现。《古国怪遇记》则属于“故事新编”式作品,是鲁迅思想和艺术在台湾传衍的例证之一。通过柏杨的杂文、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可了解1960年代台湾社会的真实状况,以及当时为数尚少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对官僚政治的思考。

关键词:柏杨文学; 官场政治弊端; 酱缸文化; 民族大爱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9)05-100-11

DOI:10.14157/j.cnki.twrq.2019.05.010

人们常用“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十年历史”来概括柏杨的主要创作历程。“十年杂文”的1960年代,是柏杨成名并建立自己的主要创作方向和特色的时期。首先是在《自立晚报》“倚梦闲话”和《公论报》“西窗随笔”专栏发表的杂文,后来结集出版了20本杂文集;其次是报导文学《异域》和章回体奇幻小说《古国怪遇记》等。它们体裁有别,但共同的问题关注和批判焦点将它们联为一体。如果说1950年代的柏杨尚未形成自己的聚焦点和风格特色,那到了1960年代,他无疑已经具备了作为一位优秀作家所不可缺少的禀赋和素质。此后他在牢狱中以及出狱后偏向于历史的写作,某种意义上都可说是1960年代的延续和深化。因此,1960年代的创作可说是柏杨文学最为核心的部分,值得格外地关注。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六十年来台湾社会思潮的演进与人文学术的发展(1950-2010)”
(16ZDA138)

作者简介:朱双一,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婵敏,女,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一、政治文化批判的动因和勇气

柏杨给人印象最深的乃其“国民性批判”视角,这种普遍印象的形成,与他在1960年代就提出了“酱缸”“奴隶根性”^[1]等概念,1980年代后更有“丑陋的中国人”等说法有关。其后期的言谈文字也一再明确表示,他谈的是文化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不过我认为,1980年代与1960年代相比,包括两岸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学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从强烈的政治关注,转向了更多的文化探究。柏杨的“文化转向”,与其个人经历特别是时代语境有密切关联。如果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历史“现场”中,并联系柏杨一生经历和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类型作品作一通盘考察,还是让人觉得当时柏杨的关注、批判焦点在于政治,其中包括让他深受其害而深恶痛绝的所谓“暴政”。^[2]对于官场政治弊端的揭露和抨击是柏杨最重要的聚焦点和着力点,也是柏杨文学最为精彩、最有价值和意义的部分。出狱后的柏杨更多转到“文化”话题上,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探究产生黑暗政治的历史文化原因。

最能彰显柏杨聚焦政治问题特点的“十年杂文”阶段,始于1960年4月《自立晚报》的“倚梦闲话”专栏,终于1968年3月他因“大力水手”漫画事件而被捕判刑,而这已是柏杨第二次在台湾被捕了。1950年前后,时任教于屏东农校的柏杨购买了一台可以收听北京电台京戏和零星华南战况广播的收音机而被特务暗中盯上,并因缺乏警觉性向同事赞扬解放军不拿人民一针一线等,被捕判刑七个月,并因这一“前科”无法再应聘公职。此后他几经辗转,进入“反共救国团”工作,担任“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成为“蒋经国的人”,却又与敢于批评国民党弊政的《自由中国》交好,遭人打小报告说他在东北时曾被解放军俘虏并关到集中营受训。这项最高可以判无期徒刑的诬陷,成为柏杨从此无法摆脱的“巫蛊”:在与倪明华恋爱而被迫从“救国团”辞职时,蒋经国就曾拿出此事加以威胁;1968年被捕后此事更成为被反复拷问的重点。1960年《自由中国》与当局关系日趋紧张并最终遭查禁。柏杨就是在这样浓厚的政治阴影下开始其杂文写作的。所谓“杂文十年”,是以遭受政治迫害始,又以遭受政治迫害终的。对一位率性真诚、面对外来横逆总是桀骜不驯、勇敢面对的人而言,这将近十年的创作以弊政批判为主旋律,毫不奇怪。从刑审过程看,“大力水手”事件其实只是个导火索或曰借口而已,柏杨被捕判刑的真正原因还在于他通过各种体裁作品对当时台湾黑暗政治的抨击,严重触犯了当局的威权统治。

柏杨是在对自己以文字罹罪的危险性有一定警觉的情况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因此显得更为可贵。这一点,从当时杂文集的命名和序言中,即可略窥一二。大体而言,20本杂文集书名显得怪异不寻常。一部分似乎从正面命名,甚至“道貌岸然”,如《圣人集》《立正集》《玉雕集》《凤凰集》《道貌岸然集》;另有一些则耸人听闻,像《剥皮集》《堡垒集》《怪马集》《蛇腰集》《鬼话连篇集》等等。其实“道貌岸然”也未必是真的,如《圣人集》本拟题为《见鬼集》,只因出版商说了句“能否不要见鬼而见见其他”遂改为《圣人集》,前后书名本身即构成强烈反讽。作者又称《立正集》书名与书的内容全无关系,反过来可知书名本身包含某种政治意涵——“立正”会让人想到操练军队以及下级见上级的某种规制,而该书序言中说明《左传》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加上“立正”而成四,“盖年头大变,左氏的三不朽,已不能包罗万象,另外还有一种不朽,应运而生……夫一个人如果其品既不能立德,其力又不能立功,其智复不能立言,难道就铁定地要与草木同烂了乎?当然不会,只要他善于立正,照样也可不朽。”而“立正者,主子面前,足跟努力并拢,锵然有声;足尖自动外分,悠然有度。颈低、眼眯、耳竖、脊椎骨猛弯,一脸驯服之状,随时随地表示心甘情愿,主子叫他昧尽天良他固心甘情愿,主子叫他害朋友,卖国家,他也心甘情愿。”这“立正”虽属第四等,“但其官必日隆,其权必日大,其汽车必日小,其洋房必日高,其美女必日众,其大名必日响,其国外存款必日多……”^[3]“立正”一词后来还反复出现在柏杨作品中,像《古国怪遇记》中就有所谓

的“立正大学堂”其直指恶质官场的政治批判锋芒和反讽意味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牵肠集》命名乃因作者觉得自己每写一本书“就等于在虎老爷背上骑了一年”,时刻担心“虎老爷回头一口,尊头就进其尊牙”,不断向观世音菩萨赌咒曰“以后永不敢再写啦,如不革面洗心,定遭横报”;也曾跳下虎来,但马上又纵了上去,“非是舍不得虎背,而是一旦稿费断绝,老妻幼孙,啼饥号寒,比吃了我还惨”,像这样“进也不得,退也不得”,怎不叫人“牵肠”欲断?^[4]至于“倚梦闲话”系列最后一本《剥皮集》,作者宣称书名只不过是故意“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生意经”而已,其实既不敢剥别人的皮,也不会剥自己的皮。该书序言表明“倚梦闲话”收官并不意味着自己“决心改邪归正”,当它与“西窗随笔”系列各10本书出满以后,“届时我老人家如果仍懵懂如故,仍聋子不怕雷如故,当再起灶炉,另挂招牌”。^[5]这里自贬为“聋子不怕雷”及“以后永不敢再写啦”等语,说明柏杨绝非那种对自己所做之事的危险性懵懂无知之人,他至多只是怀有某种侥幸心理,不断试探着统治者的“底线”,最终还是未能保全自己。他的政治批判是自觉的,甚至是其写作的主要目标和动力。《怪马集》中一组介绍李宗吾“厚黑学”的文章明言李宗吾是自己敬慕之人,称其书之好“在于告诉中国人,一位盖世奇才,对日非的世局,其内心的悲愤和痛苦,是如何的沉重”,^[6]而柏杨自己的书,何尝不也是如此!厚黑学的矛头直指“做官的人”,特别是求官做官12字真言中最重要的“弄”字——指弄钱,即贪污搜刮敛财——这一点颇为柏杨欣赏。他明知这样做危险重重,却仍愿效法之。他的亲身经历以及对周遭现实的细致观察和感同身受,使他深刻认识到当时台湾官场政治的诸多弊端及其对社会、民众造成的巨大伤害,深恶痛绝并拿起笔来加以揭露和批判。这需要嫉恶如仇的品德,更需要为了改良社会而甘冒风险的勇气。

二、“二抓”和“飞帽”:揭露官场政治和威权统治的弊端

柏杨说道:最早写杂文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免于饥寒,所以最初只谈一些女人、婚姻之类话题;可是后来每天记者采访回来,常带回一些令人发指的社会新闻,而报社碍于人情或畏惧后果,往往不敢发表,“我就忍不住在专栏里,提出抨击”。^[7]确实,1960年代柏杨杂文的取材特点在于从现实人生世态切入,聚焦于官场政治,并延展至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探究。貌似神圣庄严其实卑劣龌龊的官场,是柏杨重点揭露和批判的对象。他创设了“官崽”这一名词来指称官员,并用“二抓”来形容其中不良分子只顾揽抓“权”“钱”的特征。如所谓“国大代表”,本是两岸隔绝所产生的一个特殊问题,1980年代后被讥为“万年国代”,而柏杨在1960年代就将矛头指向他们,既要有敏锐洞察力,又要有无畏的勇气。他指出“选民”在大陆,“代表”却在台湾且任期无限,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却白领干薪,薪资优厚却还难以满足。他写道:12年中他们已开了三次会,每次两个月,平常则每月有一两千元(将来可能上涨到四五千元)薪资,却一开会就争自己的待遇,要求“向立法委员拉平”,甚至以拒绝盖章作为要挟。对于有人质疑为啥不向金门前线官兵拉平,“国大代表价钱如涨到四千元一个月,便等于两百个战士矣”等等说法,柏杨称其为“无理取闹”,因“自古人都是往上爬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使国大代表往下爬乎”?^[8]作者表面上为“国代”说话,实际上将其荒谬性暴露无遗。另有《小插曲》一文,写一对均为“国代”的夫妻,为了多得一栋公房而“假离婚”,没想到假戏真唱,女代表另有新欢,男代表人财两空而演出了一场全武行。^[9]由于主角是贪得无厌的所谓“国大代表”,该文显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批判意味。

在《闻过则怒集》等杂文集中,柏杨对于被称为“二抓牌”的不良官僚,有集中和深入的揭露和批评。所谓“二抓”即抓“钱”和“权”。既然权和钱不是正常来的而是张牙舞爪“抓来”的,“于是你也抓,我也抓,无人不抓”,且各有各的抓法。钱与权看起来虽有分别,实际上“阴阳调和”,“抓到了钱,就等于抓到了权;抓到了权,也就等于抓到了钱”;反过来说,没有权很难抓到钱,没有钱想抓权也困难。^[10]“抓钱”的方法,一是靠别人送红包,二是靠贪污,显然都有风险,而台湾法制的健全就

为贪污受贿打开方便之门。为此柏杨又自创“说不准学”来揭示这种情况“同样是公务员,经由太太之手收受贿赂,贪污有据,有的夫妻一并判刑坐牢,有的竟宣告无罪,还要官复原位”,法官可以声称“奉命不上诉”以“配合国策”;至于官员收取红包,“已视为义所应尔的常情,靡然成风,肆无忌惮”。^[11]正因为一切都“说不准”,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因此大家都能抓就先抓。

当官可“二抓”形成了争当“官崽”的社会风气。柏杨又揭示了如何才能成为“官崽”的路径,同样荒唐和可笑。大“官崽”有权力给别人官做,在他周围就会形成一个圈圈,圈内圈外有天壤之别。如何使自己跻身“圈内”?柏杨提出了“难得糊涂学”“买西瓜学”“敲门砖学”“挨骂学”“一脸忠贞学”等,其要义在于:需要表现出对上级主子的绝对忠诚,又要装得老老实实,绝不暴露自己的聪明才智。例如主子吩咐向南去买西瓜,尽管明知北边才有西瓜摊,出门后也要头也不回地向南边走去。如果自作主张到北边买来西瓜,主子可能一时很高兴,但过后一想,如此聪明的人今后对自己是个威胁,就会找个借口开革之。买不到西瓜也许一时受到斥责,但过后主子“龙心一想‘咦,他不过脑筋不灵活罢了,这种买油钱不能买醋的人,最忠贞可靠。’说不定马上就派你当军机大臣”。^[12]很显然,这正是“官崽”群体无论是其品德或是其能力都普遍低下的主要原因。

如何进入“官崽”行列和如何“二抓”是问题的一方面,更严重的另一方面是“官崽”如何利用手中权力管制、欺压一般平民百姓。警察乃“官崽”行使其权力的重要工具。柏杨宣称:社会的黑暗和恶行,多半来自警方,“这使警察先生在我的杂文中,占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他又自创了“三作牌”一词指称警察。这起因于当时全岛所有警察局、派出所墙上都有九个斗大的字“作之师,作之君,作之亲”,柏杨斥之曰“一个警察居然自命是人民的教师,已够自大,还要当人民的君主,我认为其心可憎,最后还要当人民的爸爸,就更不可宽恕”。^[13]具体说来,为君为父二者,即“随时可揍你辱你,我们的屁股乃天生的供其打板子之用,鼻孔乃天生的供其灌凉水之用,双腿亦天生的供其上老虎凳之用”。“作之师”相对温和,但碰到他一时高兴或不高兴,“训之责之,骂之咒之,连母妻儿女,恐怕都得沾上油水(按:指骂三字经)”。具体事例如台北名钨何秀子饱受警察骚扰和索贿,走投无路而服毒自杀,遇救后召开记者会加以控诉。警察局长大怒,表示非取缔她不可。^[14]又如,台北发生官商合作走私巨案,一批“三作牌”也涉案被关,警察太太们联合请愿,咬定其丈夫受到苦刑拷打。记者问她们如何得知?答曰“哪有被告到刑警手里不受刑的……我们自己人知道得最清楚。”柏杨据此描绘出有如活地狱的一幕“三作牌”把小民打了个够,斥其贪赃祸国,违法乱纪;回到家后对太太说“那家伙硬不肯招,点纸烟,扎夹棍,上电梯,坐玉墩,啥办法都使尽啦,屎尿都出来啦,他还是不招”,并表示明天还有更厉害的招数。然而第二天,夫妻两人在公开场合都否认对犯人用刑。现在“三作牌”自己被抓,其太太能相信丈夫没有被用刑吗?不久官方决定撤销该案,柏杨作出结论“几乎所有的巨案都是用草纸把流出来的脓擦掉便算,没有人敢再挤。”^[15]显然,柏杨也曾坐过牢,才能知悉牢狱中的扎夹棍,上老虎凳,“就是痛死,都没有痕迹”等情事。一般而言,“官”和“吏”在统治机器中是相互勾连的结构体,警察属于“吏”,不少坏事由警察具体实施,一些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警察因此也成为柏杨讽刺、批评的主要对象之一。

也许柏杨觉得单纯的杂文还难以尽情表达他对于“官崽”的观察和批评,才有了奇幻小说《古国怪遇记》。这是一部“故事新编”式作品,但更为汪洋恣肆,借用《西游记》唐僧师徒前往西天一路收妖伏怪的故事框架,将不同时代的奸臣贪官(秦桧、赵高等),荡妇美女(潘金莲、潘巧云、赵姬姬、贾玛丽、李师师等),帝王将相(唐太宗、宋太祖、吕不韦、张飞等),圣贤名人(孔子、孟子、李白、杜甫等),乃至古代现代的事物(如录音机、汽车、核子喷射船、《大唐日报》、民主法制、媒体炒作、回国观光华侨等概念以及“迷死脱”“打狗脱”“豪都油都”“欧开”“鼓得白”“爬死”“白白”“砍杀尔”“艾客死求死米”等洋泾浜英语以及日语“撒油那拉”)等,放在一起煮成一锅“大杂烩”。但小说绝非搜奇猎怪的休闲娱乐之作,而是充满了政治、文化的意涵。其中最为重要的不外有二,一是借域外故事而对现实政治弊端加以揭露和批评;二是对当时台湾社会弥漫的媚外风气加以嘲讽。关于前者,

与杂文一样,可分为两个要点,其一是对于“官崽”内部争权夺利、钻营倾轧以及其抓权抓钱的“二抓”行径的描写和讽刺,其二则是官僚机器向外对于社会和民众的压制、管控和迫害。

小说开头就是奸佞权臣玩弄权术迫害忠良的一幕。唐僧一行从西天取经回来,唐太宗要封他为“一字并肩王”。时当秦桧掌握朝政,心中嘀咕自己是否会被挤垮。此时,赵高(秦末奸臣)看准机会,前来钻营。他设套录下唐僧对秦桧的不满之语,让秦桧将之作为在皇帝前构陷唐僧的铁证。秦桧称唐僧散布流言、动摇民心、“隔沙漠与突厥相唱和”——很容易让人转套成“隔海与共党相唱和”——成功遏阻了皇帝对唐僧的提拔重用。唐僧只好以翻译佛经赚点稿费为生。但由于背上了“专唱反调”罪名,《大唐日报》拒登其稿。这些描写既展现了官场倾轧、奸臣排斥异己的弊政景观,同时从暗中录音、拒刊稿件、指控“散布流言”“动摇民心”等细节,也可明显感觉此乃作者对当时笼罩台湾的白色恐怖的影射。此后书中不断出现诸如“思想问题”“灰色思想”“行为不检”“扰乱金融”“道德重整”以及作为警察局、刑警队、军法处等机构之隐喻的“修理庙”等特殊意涵词汇,连孔子、孟子都被戴上了“鼓吹邪说”“鼓动风潮”“动摇国本”之类帽子的描写,也都有相似的意涵。

在三餐不继、走投无路之时,唐僧师徒利用当时崇洋媚外、出国留学之风,冒充通天教士,组建“车迟国朝圣团”,吸收了孔、孟、李、杜,择吉日浩浩荡荡开拔而去。他们先后途径红包国、猛生国、开会国、诗人国、西崽国、恶医国、飞帽国、官崽国等。尽管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弊政形态,但威权腐败政治的阴影总是黑压压地笼罩着。如红包国顾名思义行贿受贿严重。在猛生国讲“节育”就有被监禁乃至阉割之虞。恶医国中恶医和“官崽”相互勾结敛财害民。诗人国有所谓“官越大,诗越好”的“官诗”,向其颁发文艺奖金则让人想起为鼓动“战斗诗”,台湾地区也曾设立了多种官办文艺奖。最扣人心弦的也许是飞帽国之战。该国“栽赃大王”手下四员大将分别为小报告、和稀泥、窝里斗、往上爬,其法宝为帽子。帽子的威力按颜色分等,像猪八戒能用五齿耙将灰帽筑了五个窟窿,却对付不了黑帽,而妖精深知黑帽灰帽白帽均非孙悟空对手,因此祭起一顶红帽,将孙悟空打倒。孙悟空一路过关斩将,却败在一顶红帽下,可见这顶红帽非同寻常。柏杨似乎以此影射白色恐怖中惯于给人扣红帽子的举动,这在当时非有超人勇气不可。当最后这些帽子破功时,原来只不过是几块烂破布,一钱不值。柏杨想说的是:帽子在其得势之时,不可一世,能轻易置人于死地,但究其实只是纸老虎而已。

《古国怪遇记》最后一章是《官崽国》,归结到整部小说的主题。官崽国是一个“官崽”扎堆的国度,连酒女都有官职。来客感到奇怪,得到的解释是“她们若非官崽,怎能这般无耻?”可说有指桑骂槐之效。末尾写到源源不断培植“官崽”的教育体系:

立正大学堂内分两大学院,一曰抓权学院,一曰抓钱学院。院下分系,曰往上爬系,曰你挤我我挤你系,曰反淘汰系,曰谣言制造系,曰盖章系,曰官腔系,曰整人为快乐之本系,曰请示为负责之本系,曰马虎为成功之本系。所修功课,有“死不认错学”、“奉命不上诉学”、“狗眼看人学”、“红包学”、“受贿原理学”、“行贿艺术学”、“说不准学”、“么鸡吃烧饼学”、“嘴脸学”、“妒火中烧学”、“官府威信学”、“皮笑肉不笑学”、“鼻孔朝天学”、“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学”、“亲临主持学”、“以示民主学”、“酒肉朋友学”、“一个图章一道关学”、“小报告学”、“择恶固执学”、“诬以谋反学”、“无耻近乎勇学”、“吹牛不纳税学”、“一脸忠贞学”、“玩女人也被女人玩学”、“汽车洋房学”、“舐痔疮学”、“自由心证学”、“空头学”、“论权不论理学”、“栽赃学”、“不把人当人学”、“致训词学”、“尾大不掉学”、“修理学”、“官大学问越大学”、“屎到屁眼才拉学”等等等等,真乃世界第一大学堂也。^[16]

这段话罗列了柏杨杂文中批评“官崽”时创设的诸多名目,证明《古国怪遇记》其实是其杂文创作的延续或变体,既批评“官崽”内部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的弊政,又揭露官僚对普通民众的压迫和掠夺。柏杨紧紧把握其政治文化的批判焦点,以奇幻小说为其杂文作了艺术的升华。

三、挖掘官场政治弊端的历史文化根源

柏杨创作的特点之一,在于他并不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揭露和批判,而是进一步挖掘现象产生的深层历史文化根源。在柏杨看来,政治和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有某一种文化,才有某一种政治,有某一种政治,才有某一种气质。”他曾对“酱缸”一词加以解释:中国北方农村酱缸随处可见,“酱是不畅通的”,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但时间久了,“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紧接着他又讲道“中国文化中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是‘官场’。过去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就在做官。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这种“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的文化,即所谓“酱缸文化”。^[17]至于台湾,更有加重趋势“从前的酱缸固是酱缸,却是大酱缸,还偶尔有点空隙。自从来到台湾,大酱缸变成小酱缸矣。人的想法、看法、见解,也跟着更浅、更短、更庸、更俗、更教人起鸡皮疙瘩。”^[18]在柏杨看来,腐败的官场政治与“酱缸文化”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和动力的。因此要纠正官场政治之弊,深挖其传统文化根源并痛加反省,无疑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

柏杨反省中国官场政治弊端传统文化根源,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揭露统治集团为维持其权力而表现出的残酷性及其缘由。中国古代皇帝自认为受天命而掌天下,全天下的人都是自己“赏饭”给他们吃的,对他们也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在这种观念和体制下,皇帝往往被一群官僚特别是争权夺利的奸臣所包围,形成“圈圈”,圈外的都被视为异己。柏杨根据胡秋原所著《中国英雄传》转述了中国数千年来为了民族、国家而浴血奋战的英雄人物,最后却被皇帝、朝廷所杀害的血迹斑斑的史实。例如,杨家将为保卫宋朝江山立下汗马功劳,宋真宗却仍认之为“疏外之臣”。对此柏杨写道:这种话叫人听了实在寒心,“疏外者,一辈子都在圈圈外,流再多的血都跳不到圈圈里也”,而且“即令在圈圈外,仍有‘嫉妒之人’,努力构陷,不垮不止,不死不休,悲夫!”^[19]最能表现出昏庸皇帝的不智和残酷的是明朝末年袁崇焕被杀事件。袁崇焕“一身系明王朝的安危,明政府上自皇帝,下至大官小官,狗命都握在他手里”,然而他不但硬是被杀,而且还是被刷。柏杨总结道:古代中国很少有光荣结局的民族英雄,“五千年来,凡当权的家伙,几乎是除了二抓牌,就是二抓牌……中国的历史好像是一系列的奸胜忠败,劣胜优败的反淘汰历史”。^[20]这种情景即使到了当代台湾,仍屡屡上演,这是柏杨作品的现实针砭意义之所在。

柏杨反省黑暗政治的传统根源的第二个面向,从高层统治者转到了更广大人群。其中又分为两个重点:一是介于高层统治集团和一般民众之间的文人、知识分子群体(含中低层官员)。柏杨自创“赏饭学”术语,指出:在封建体制下,中国文人唯一出路是金榜题名,但即使科举得中,仍属于被赏饭吃的,“咬定一个主子,吃人一碗赏下来的饭”,除此之外想活下去都有困难,自然产生了“人生以做官为目的”“一切为主子服务”的哲学,^[21]也必然缺乏自尊自强自主的人格。如今更每况愈下,“从前对人,以国士待之,则人以国士报之。而今对人,以奴才待之,用玩奴才的手段去结死党”,却希冀该奴才像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只不过是异想天开罢了。^[22]

当然,中国人、中国文化也非天生缺乏灵性。柏杨认为,从秦汉之际叔孙通的经历,可知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很大部分被迫用到官场权力追逐上去了。在秦二世面前,众官如实汇报陈胜起义的消息,唯有叔孙通称:明主在上,安有反者?何足忧。龙颜大悦,给予重赏。众官责备叔孙通说谎,答曰:如说真话,今天大家可平安回家吗?叔孙通发财后看准秦将亡,及时抽身,带着一群学生投靠了刘邦。但最初他向刘邦推荐“群盗壮士”而不是自己的学生,引起学生不满。他解释道:刘邦正在打天下,当然先推荐泼皮亡命之辈。最后战局底定、天下太平,皇帝转而对武官居功自傲伤

脑筋时,叔孙通才推荐其学生,学生欢声雷动,称其为“圣人”。柏杨指出叔孙通最大的功劳是为“圣人”下了定义:圣人者,“知当世务”,即自己能弄到官做,也能给人官做之人也。其间叔孙通当然玩了权术说了谎,但“我们能责备叔孙通先生骗乎”?[23]显然,这并非个人的品格问题,而是整个封建体制、“酱缸文化”下的不得不然。

“酱缸文化”的危害还表现在更广泛的一般民众身上。历代民族英雄遭遇冤屈时,他们往往当了麻木不仁的“看客”或者竟是“帮凶”。明末黄道周被清军所捉,千里押京,慷慨就义,但沿途所见没有一点亡国景象。时逢新年,小民百姓吃喝玩乐、热闹非凡,忽见一个白发老头戴枷铐镣,遂一拥而上,一听犯了叛乱之罪,又吓得一哄而散。只有若干顽童捡起石子扔黄道周,以示薄惩;老年人则叹曰“这么大年纪,不知安分,竟去造反,真是个大傻瓜。”另一个例子乃清末《康圣人显形记》一书所写戊戌六君子临刑一段,其末尾是“只听一排枪炮声,这六名官犯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柏杨写道:看杀六君子 and 看杀黄道周热闹的人,有啥不同也欤?时间上虽隔了三百年,民族灵性却依然如故。该书作者一口咬定六君子“有懊悔之状”,对这些爱国斗士大呼“不合算不合算”,真是以猪猡之心,度龙虎之腹,“呜呼,伟大严肃,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竟成了知识分子的嘲弄对象,这正是中国社会上特有的媚察气质”。这种不讲是非,也不懂是非,只一味追求荣华富贵的传统,“把中国人的灵性酱得欲僵欲死”。柏杨进一步写道“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却去拼命鼓吹对权势的驯服,和对富贵功名的追求……呜呼,中华民族复兴之机,看来使人紧张。”[24]柏杨将此文化的改造视为事关“民族复兴”,可说极有见地,而字里行间透露的对于民族前途的关心乃至某种担心和焦虑,令人动容。通过“看客”形象反省国民性弱点,柏杨与鲁迅可说是一脉相承。

四、责苛缘于爱切:柏杨的平民立场和民族之爱

继1960年代的“酱缸文化”,柏杨在1980年代更提出了“丑陋的中国人”说法,遂有柏杨是否“爱国”的疑问。其实早在1960年代柏杨就已遭遇这一问题。他写道“圣人教你爱国,好吧,你爱国试试,因为爱之切,所以责之苛,因为责之苛,二抓牌自然嘿嘿冷笑。”有如一条木船,有人凿洞,有人用淡水洗澡,有人把帆布剪下做西装,你喊曰“不要凿啦”“不要洗啦”“不要剪啦”,否则船要沉了,全体要渴死了,“全船只听见你阁下一个人嗓门,好像就你聪明,别人干这也不对,干那也不对。嗟夫,你不会被扔到海里,难道凿洞锯桨同志被扔到海里乎?那些凿洞锯桨同志,一个个都是忠贞之士……吼曰‘你说啥?船会沉?你是何居心?’”[25]这里作者自称的“爱之切,所以责之苛”,笔者是颇为认同的。

柏杨的“爱”至少有两大指向,一是与“官崽”相对的平民百姓(也包括部分中低阶军公教人员)。柏杨与他们站在同一立场上,尽管有时也会对他们的某种“酱缸文化”气质加以批评,但更多的是关爱和同情。二是指向了中国和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无疑是伟大的,但在其漫长发展过程中也会积累某些负面因素和性格。讳疾忌医绝非正确选项,因此怀着拳拳之心对其缺点加以揭露以求得“疗救的注意”(鲁迅语),反而是一种大爱的表现。

在1960年代的杂文中,柏杨就站在平民立场,写出特权官僚和无权百姓之间的区别并将关爱情感投注到后者身上,有时更发掘出中国人的高贵品行。如他写道“官崽”们“二抓”,一些中小学教师热衷于兼课捞外快,“结果苦了一些既没啥可抓,又没啥可兼的老弱残兵,用别人一双皮鞋的钱,来养活全家。”他曾走进邻居家中一瞧:一家六口挤在一间六席小房中,太太眼盲,孩子们在门口污水沟中捞野菜吃,只能大喊“悲夫”;此外还有“蓬头垢面,衣服遮不住腰,脸瘦得只剩下两只眼睛”的人家。[26]显然,“二抓”盛行的后果是贫富差距扩大:一边是“官崽”们肆意挥霍享受,另一边是广大民众陷入贫穷困顿之中,这里柏杨表达了对前者的不满和对后者的关爱。又如,野柳发生了

教师为抢救落水学生而牺牲生命的感人事迹,却未得官方应有表彰,盖因“官崽”们“官性正浓,往上看有精神,恐怕无工夫往下看也”。^[27]舍己救人正是中国人未必都自私、怯懦的明证,本是大力宣传以改良社会风气的好机会,却被“官崽”们轻易地丢失了。

表达对“官崽”贪污掠财、鱼肉百姓的不满并发掘普通民众精神闪光点的主题在《异域》一书中得到充分体现。《异域》描写缅北国民党“孤军”在极端艰难环境下苦撑坚持的事迹。与当时台湾盛行的“反共文学”的最大不同,一是它用了不少篇幅,揭露国民党高级将官与底层官兵待遇上的巨大差距及前者的种种不良作为。其中最令人胆寒的是前线将士出生入死,高官们却纷纷弃之于不顾,甚至贪污拨给孤军的钱款和军备物资,用于在台北、曼谷等大城市里纳福享受,“成为一掷千金毫无吝色的时代宠儿”。“孤军”的实际指挥者李国辉前往台湾受训时,将其眷属带到曼谷,回来时发现妻儿被人像垃圾似地堆到两栋巨厦之间的一间小木屋中,饱受穷困、孤独和歧视,而两旁巨厦分别为其上司李弥将军夫人的弟弟和姊丈所拥有,而它们是靠“孤军的血和美国钞票盖成的”。^[28]五个月来李弥对于这位战斗在第一线并立下汗马功劳的属下的眷属,虽仅一步之遥,却没有一句探问关心,任其自生自灭。这里又可见柏杨杂文中抨击的“二抓牌”“官崽”的身影。《异域》对于抛弃部下卷款而逃,后来却坐上“国防部”高位者的批评,曾招致“国防部”封闭报社的威胁和对作者本人的警告,可见该作所具有的批判力度。^[29]

《异域》的另一个特异之处,是在与高官“二抓”行径对比下,写出了一般官兵艰难险恶的人生处境与困境,并表达作者的深厚同情。“不管有些官员发了多少万美金的财,我们弟兄的月薪,却始终只有两个老盾”。作品详细描绘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吸几口就会致命的瘴气,让人终生疟疾的毒蚊,可吸尽人血的蚂蟥,轻而易举将人叼走的老虎,还有土著的毒箭,连绵不停的雨季……更主要的是无休止的行军、战斗、撤退、转移,在飞机轰炸、炮弹倾泻而下时,来自台北或曼谷的长官电报仍是“死守”“死守”!有次行军出现三百匹骡子,但“它们背上坐的只是李弥将军总部的人”,而没有为他的部下多驮一点饭团和饮水。^[30]每次出征都有可能战死疆场,让家人陷于恐惧哀怨之中,“我”的一对儿女因为恶劣环境先后夭折,成为难以忍受的锥心之痛。

尽管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却总是默默无闻,与草木同朽。当他们历尽艰难站稳脚跟时,当局却命令撤回台湾,到台湾后又未作妥善安排,“立过血汗功劳的弟兄大批投闲置散”,陷入贫困中:有的压面条,有的磨豆腐,有的做浆糊生意,有的当砍竹子的苦工,艰难但顽强地求生存。作者写道:使这些志士们“凄苦的老死窗牖,实在是一个悲剧”。^[31]尽管柏杨并非其中一员,但也许因为他与这些缅北将士属于同一阶层,有着相似的颠沛流离的经历,因此能够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给予深厚的理解和同情。他们与“官崽”们截然有别,与麻木“看客”也有不同的精神面貌。无论在战场上,或是后来穷困潦倒为三餐而奋斗,他们都是自尊自强,“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人。柏杨深知“民族的自尊建立在个人的自尊上”,“个人自尊即民族元气,保持一分算一分”,^[32]柏杨显然在这些卑微而自尊的个人身上,照见了民族的希望和信心。

比起平民之爱,柏杨的民族之爱显得更复杂和丰富一些。其实从他对民族英雄总是遭受迫害的揭露和批判中,就可明显看出其爱国爱民族之心。如读到袁崇焕遭磔刑,“三百年后的今天,每一思及,眼前仍浮出一幅绞心的图画”。他按照胡秋原《中国英雄传》上人物写来,宣布“到此为止”,“不再写矣”,因为“心如刀割,也写不下去矣”。他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他们的圣人、英雄如果都不能有好下场,“这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准有毛病”。^[33]很显然,他是出于救治目的而探寻中国文化在长期封建统治下所产生的毛病的。对传统文化反思最为沉痛的地方,也是其民族意识、民族精神表现得最为强烈的地方。

无可否认,柏杨经常表达对于外国特别是美国的钦羨和赞赏。如《怪马集》中《丑陋的美国人》一文题目,本为美国人所撰书名,该书“暴露美国驻外使节的过失和丑态”,但美国政府不但没有抓人和查禁,反而加以研究以求改进。^[34]这或许就是20年后柏杨撰写《丑陋的中国人》的最早触发

点。柏杨还经常将西方选举制度与中国政治制度相比较而认同前者。一个人一方面批评中国的政治、文化乃至中国人的性格,另一方面却对美国多所赞扬,这能够说是爱国爱民族吗?但如果结合当时思潮语境而对柏杨创作加以全面的考究,这种疑问是不难打消的。就文坛谱系而言,柏杨很早就与以胡适为精神领袖、具有西化倾向、对国民党当局有所批评的《自由中国》“情投意合”,即使因此受到训诫仍不改其志。他向该刊投稿并参与其作者圈“春台小集”聚会,^[35]最早写杂文时甚至以《自由中国》作为自己的“第一道防线”。^[36]然而,柏杨对胡适的西化主张并不认同,曾写道“即以一代思想家,万人尊敬的胡适先生而言,他阁下的遗嘱就是用英文写的……学术固然没有国界,但遗嘱却是有国界的。且即以学术而言,也有它的民族根性。我们真不能想象英国罗素先生会用中文写遗嘱”;又称“并不是说胡适这样做就把中国人的尊严丢光……但如果是一种在自尊心崩溃后不自觉的反应,虽不损伤胡适先生的份量,却教我们这些心头徬徨无主的小民,每一思及,就更徬徨无主。”他甚至将多年来台湾的媚外西化风气称为“洋式酱缸”^[37],与“中式酱缸”相比拟。一方面对胡适有所保留,另一方面却与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如徐复观、郑学稼、胡秋原等相亲和,柏杨显然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否则不可能出现这种“一边倒”情形的。

就思潮语境而言,《自由中国》被查封后,作为其政治主张的文化延续,1962年前后,以《文星》杂志为主要阵地,李敖为旗手,“全盘西化”为标帜,掀起了“中西文化论战”。依笔者观察,论战可分为官方党属文人、西化派和中华民族主义者三拨人马。与崇洋风气相呼应,现代主义成为当时文学主潮。在这些文坛风潮中,柏杨理所当然不会站到官方一边;但他也没有站到西化派一边去,反而站到了徐复观、胡秋原等中华民族主义者这一边。他曾撰文写道“前些时台北发生一场学术论战,论的大概是‘中西什么化’之类的玩艺……盖招架不住的一方,以居浩然先生为首,祭起各色各样的帽子,把胡秋原、郑学稼、徐复观几位先生,祭的晕头转向”,其名目包括“汉奸”“曾经反抗过政府”“思想有问题”“共产党”等等,“只要能把某一顶帽子扣个结实,则对方或杀头焉、或坐牢焉……他阁下的论战就大获全胜矣”,并称之为“妖风”。^[38]文中所指乱扣人帽子的,即西化派。作者的倾向极为鲜明。

最能说明问题的,除了杂文外,应属鲁迅式“故事新编”作品《古国怪遇记》了。该作除了批判官场政治弊端外,讽刺媚外西化之风是其另一焦点。“朝圣团”组建时国人趋之若鹜,就因当时盛行崇洋留学之风。该作在批评西化主题上的重要看点,一是列出“诗人国”一章,以当时台湾现代主义诗风为讽刺对象。诗坛有铜铃派、铁锣派、乱潮派、太空派、牛魔王派,个个要求来客听他们念诗,如不恭维欣赏,即拳脚相加。国王为迎接客人,举行海内外诗人大团结晚会,劝唐僧喝酒,因为“如不疯疯癫癫,怎能成为诗人?”潘金莲所作诗中有“夜来云雨声,多少光棍想”,此诗一出,全体叫好,因其“大胆”,而“大胆定是好诗”。但国王称:其中不夹洋字,不算上等。他自己作的诗中,“窝海佩”乃 very happy 也,“笛儿”乃 dear 也,“美丽的姑娘也”,^[39]可说既晦涩跳跃,又大胆煽情,还夹有洋字,符合其好诗的标准。作者讽刺、批评当时台湾的西化诗风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另一重要看点则是“西崽国”部分。除了“官崽”“圣崽”外,柏杨还创有“西崽”一词,顾名思义,指的是崇尚西洋,为洋人办事服务之人。唐僧曾问起其国名由来,回答是“敝国上下官民人等,敬的是外邦人士,尊的是东西夷人”,别人乃胡乱称呼,自己却觉得很好。该国人以让洋人踢打为荣,规定“每踢一脚,纹银一两,活活踢死,纹银一斤”,并享“为国捐躯”之荣耀。某日街上千万人排队等着一踢,原来某学会高薪请专家讲学,被洋人一踢乃当专家的必要条件,许多人“万事俱备,只欠一脚”。^[40]甚至有人请求被踢后见血留疤,以便靠此明显标记高人一等。这里柏杨写得夸张怪异,匪夷所思,对于媚外风气的讽刺辛辣而到位。

柏杨曾表示他主张崇洋而不媚外,其民族主义立场是毋庸置疑的。那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态度如何呢?小说中,中国文化代表人物孔子、孟子、李白、杜甫虽略显迂腐却是温文尔雅,在紧要关头只会念《论语》《孟子》或李杜诗句,无用却也无害。途经飞帽国时,有人向国王建议“孔孟二人,

穷酸一个,妖言惑众”,因此“放他不得”;但如果蒸了吃,“肉味奇酸,吃了会倒牙”,因此“不如扔到山涧,喂那豺狼虎豹”。至于李杜,却连喂豺狼虎豹也有问题,因为“文人气质,多不合时宜。豺狼虎豹吃了,万一也染上不合时宜之疾……这山就住不成矣”。这固然也是一种嘲讽,但它内在质地是温和、委婉、善意的,与前述对于媚外“西崽”、西化诗人的辛辣讽刺,不可同日而语。这正反映了柏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态度:责之苛缘于爱之切。

五、结 语

通过柏杨杂文,我们可以了解1960年代台湾社会的真实状况,以及当时还十分稀少罕见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对此的思考。蓝博洲《台共党人的悲歌》一书曾写到一个细节:1950年代白色恐怖中殒命的台共党人张志忠的遗孤杨扬,在1968年新年“自杀”之前的两三个月,曾从老家屏东写信给柏杨询问有关服兵役的事情。^[41]两个月后的3月4日,柏杨自己被捕,开始9年多的牢狱生活。杨扬与柏杨素昧平生,非亲非故,却在遇到人生难题时写信求助,反映的是柏杨在当时台湾广大读者中的名声和地位。很显然,读者心目中的柏杨并非仅是谈谈女人、情爱以吸人眼球的普通作家,对于一个为其“匪党”父亲而饱受歧视、正为服兵役等事而烦恼茫然、走投无路的青年人来说,柏杨吸引他、引发他尊重和信任的,不会是其,必然是柏杨创作中对于台湾官场政治弊端的勇敢而又机智的揭露和批判。在威权体制下以大无畏精神展开对黑暗政治的批评并探究其历史文化根源,对民族爱之深而责之切,以求疗救的希望,这是柏杨文学最为厚重、最有价值的部分,值得我们把握并光大之。

注释:

- [1] 柏杨《鬼话连篇集·序》,台北:跃升文化事业公司,1990年11月,第9页。
- [2] [7][13][29][36]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柏杨回忆录》,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6年7月,第235页,第233页,第234页,第247页,第235页。
- [3] 柏杨《立正集·序》,台北:跃升文化事业公司,1991年2月,第10页。
- [4] 柏杨《牵肠集·序》,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0年3月,第5页。
- [5] 柏杨《剥皮集·序》,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0年3月,第5-6页。
- [6] 柏杨《隆重崩殂》,《怪马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0年3月,第56页。
- [8] 柏杨《大不敬》《大张挞伐》《新年三祝》等文,见《圣人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0年3月,第18-25,48-49页。
- [9] 柏杨《小插曲》,《怪马集》,第62-63页。
- [10] 柏杨《阴阳调和》,《闻过则怒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0年7月,第31页。
- [11] [26]柏杨《说不准学》,《闻过则怒集》,第35页,第36-37页。
- [12] 柏杨《传统文化——难得糊涂》,《闻过则怒集》,第67页。
- [14] 柏杨《坐着整人》,《圣人集》,第44-45页。
- [15] 柏杨《窝里真言》,《圣人集》,第120-122页。
- [16] [39][40]柏杨《古国怪遇记》,台北:远流出版社,1980年10月,第335页,第191页,第225页。
- [17] 柏杨演讲《北美日报》记者记录《中国人与酱缸》,收入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台北:星光出版社,1992年8月,第64页。
- [18] [20]柏杨《酱缸》,《闻过则怒集》,第48页,第49页。
- [19] 柏杨《英雄人物》,《闻过则怒集》,第55-56页。
- [21] [23]柏杨《人生以做官为目的》,《闻过则怒集》,第103页,第103-107页。
- [22] 柏杨《骂》,《闻过则怒集》,第102页。
- [24] 柏杨《荣华富贵》,《闻过则怒集》,第44-47页。
- [25] 柏杨《参与感》,《闻过则怒集》,第75-76页。
- [27] 柏杨《野柳义魂》,《闻过则怒集》,第42页。

- [28] [30] [31] 邓克保(柏杨:《异域》,台北:星光出版社,1977年11月,第50页,第100页,第145页。
[32] 柏杨《建议三项》,《闻过则怒集》,第124页。
[33] 柏杨《愚恶》,《闻过则怒集》,第63页。
[34] 柏杨《丑陋的美国人》,《怪马集》,第15页。
[35] 聂华苓《炉边漫谈》,柏杨编《对话战场》,台北:林白出版社,1990年3月,第31-32页。
[37] 柏杨《冒出几个主意》,《闻过则怒集》,第122页。
[38] 柏杨《妖风》,《圣人集》,第99页。
[41] 蓝博洲《台共党人的悲歌》,台北:台湾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第6-8页。

(责任编辑:蒋小波)

The Foc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o Yang's Criticism of Political Culture

—Focusing on Bo Yang's Creation in the 1960s

Zhu Shuangyi, Chen Chanmin

Abstract: After the forced closure of “Free China” in 1960, Westernized intellectuals such as Li Ao turned to cultural criticism, while Bo Yang still remained persistent in political criticism and became the first person in Taiwan to expose bravely the real political abuses in the 1960s. He satirizes the “two grasps” of the bureaucratic rulers who grasp both “power” and “money”. On the other hand, he exposes the suppression, control and persecution of the public by bureaucratic machines, including “white terror”. With the help of Hu Qiuyuan and Li Zongwu's works, He, compatible with Xu Fuguan and other university Masters, further explores the deep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oots generated by corrupt officialdom politics, deepening his reflection on the “sauce jar” culture, thus posses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ideological history. In fact, Bo Yang's “blame for harshness” is due to his “love of all”, full of love and sympathy for the general public, demonstrating the hope and confidence of the nation in the humble and self-esteem of the people. He opposed the prevailing trend of Westernization in Taiwan at that time, and like Lu Xun, the purpose of his reflection on and the criticism of the weaknesse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as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healing and salvation, thus showing his great love for China and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tory of *The Strange Experiences of Ancient Countries* belongs to the new edition of stories, which is one of the examples of Lu Xun's thought and art spreading in Taiwan. We can understand the real situation of Taiwan society in the 1960s and a few critical intellectuals' thinking about bureaucracy at that time through Bo Yang's essays, novels and reportage.

Key Words: Bo Yang's literature, political malpractice of officialdom, “sauce jar” culture, national love